

機械系部分同學 和人民日報編輯部座談

5月15日，機60.1、機59.1的部份同學和人民日報編輯部同志（下稱編輯部）舉行了座談。座談會上，同學們提出了許多有關整風的問題，編輯部的同志根據同學們提出的問題發表了意見。現將其中的幾點主要內容轉述如下：

(一)

編輯部認為，人民日報是全體人民的報紙，也是黨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編輯部對黨中央負責。但人民日報的社論，並不都是黨中央在講話。它們有的是中央的同志寫成，有的是編輯部寫成後由中央審閱過的，也有的並沒有審閱過，就是編輯部的意見。總之，社論是根據客觀形勢的要求，依據着黨中央的意圖、政策來使之貫徹實施的。對中央的意圖領會得不好，政策掌握不好而社論中有了缺點、錯誤，是由編輯部負責。

編輯部說：社論的發表與否，是運動各階段提出的要求，不是主觀意願決定的。每篇社論都有所針對。

編輯部談到，六月八日的社論，所針對的乃是“恫吓信”這一嚴重事實，也指向和這些人在思想上、政治上乃至組織上一伙的人。讓別有用心的人大放厥詞，勢必引起紊亂，對鳴放大為不利。編輯部繼讀郁文之後，收到若干匿名信件，有聲稱“中南軍政委員會司令、副司令完全支持匿名信和葛佩琦”其實，那裏有什麼中南軍政委員會？！

六月九日的社論，闡明批評與反批評的關係，是針對當時的一種風氣的。這種風氣認為凡說正面話、講馬克思主義道理的人，統統都是教條主義。因之，有必要為講正面話的人創造條件，助人民之威。

編輯部說，共產黨肚量大，“氣吞山河”，但也有個限度。向黨提意見，片面的也好，偏急的也好，激昂慷慨的也好；這與別有用心人的“意見”要區別開來。對後者是不能容忍的。社論

還要有，問題不能一下子全談清楚。編輯部希望同學們應該把几篇社論聯繫來看，深入分析與體會。

(二)

右派，其所以成派，非一人也。所以成一“派”，因為他們是互相補充的，並且有着共同的特點：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黨。右派在發展，在分化，是運動着的。

編輯部說：在區分右派時，是對他們作了歷史的，現狀的全部分析的。一般的問題不提名道姓的指出來。把右派指出來，指中的人有的是，指出的却只是極少的幾個。他們是有代表性的“份子”。稱為“份子”，是掌握了充分根據的，其中一些，要逐步公開出來。

編輯部指出：右派的人，看准了我黨的缺點——對某些工作的某些方面還不能領導——便從根本上動搖黨的領導地位。

別有用心的人，處心積慮地在太陽上找黑點，並認定這是一切壞事情的根源。右派的人，污辱馬克思主義為教條主義，以封人口，趁勢奪取群眾。別有用心的人，杀气騰騰的要挖掉黨領導的基礎。

編輯部約略地談到：葛佩琦是右派。他經過思索的一再強調要“殺”，說什麼沒有共產黨人家也不會賣國等等。他提到殺的“前提”，比之他所強調的“殺”，就看得很清楚了。他發表的煽動性的，杀气騰騰的“意見”，恰恰是他思想的外殼。

儲安平是右派。編輯部由此掌握的大量材料認定，他對共產黨的意見，在用意上，態度上，氣勢上，意味上與當年對國民黨毫無二致。這至少是資產階級立場站得很穩。（反對國民黨，反對共產黨）。

章伯鈞是右派。作為一位政治代表人物，他提出要搞“政治設計院”，要和共產黨爭領

導，要“發展二百萬黨員”，與共產黨分庭抗禮，要搞“上議院”。此外，事實證明他對儲安平有所指使。這種動搖黨的領導，爭奪領導權的“意見”，歷史教訓了黨，決不能夠容忍。

章乃器作為政治經濟學家，為定息不是剝削這一基本觀點進行辯駁，“振振有詞”。對各種事實的現象，要进一步分析，許多材料和論點要陸續刊出。

編輯部說，發表社論，是為了在思想界、文化界掃去出現了的烏煙；掃清鳴放的障礙。鳴放不是為鳴放而鳴放，為的是對社會主義有利。毒草可以放，但不能壓制了鮮花的放。邪氣壓下去，正氣才可以自由鳴放，有什麼不好呢？發表這些社論，有人不懷疑，也有人懷疑。懷疑的人是因為看到的材料少，這當然可以理解。要繼續深刻化，搞清楚。先出社論，後才陸續大量公佈事實材料，是否恰當，作為意見接受，加以考慮。由於社論，也使有些人產生了顧慮，這是不必要的，是誤解了社論的意思。

編輯部說，人民日報的社論不是結論，作為一家之鳴，提起大家注意一些問題，大家還可以討論。劃分右派，也有欠妥的時候，有錯誤一定要承認的。這次幫助黨整風是“主調”，劃清右派是客觀要求的一支“插曲”，很主要，對青年人尤其是一個政治風浪，要當一次政治課來學好。

編輯部再三強調：同志們不應該簡單的用“右派尺度”來衡量別人。傷了感情對鳴放不利。編輯部比同學有更多的政治經驗，掌握更多的材料，作了更深的研究，才把最為顯明的極少數代表人物歸為右派。同學們應該更詳盡的調查研究，聽取和善意的提出意見。決不要輕率的劃分起左派右派來。

編輯部最後說，歡迎用各種方式交談意見。

人民日報編輯部出席座談的是趙忠信、風堯生二位同志，他們的發言代表編輯部。

上稿由陳大剛執筆，傳達不確之處，由筆者負責。

使我院整風運動進一步深刻化

方正知

我院整風怎样才能深入，我認為：

(一) 要繼續虛心傾聽大家對黨組織及黨員的意見。

(二) 要積極整理群眾的意見，迅速處理目前所能解決的問題。

(三) 要廣泛開展“爭鳴齊放”，只有這樣才能把問題搞得透，才能把運動引入深境，否則就會使運動停滯不前。現在流傳着這樣的論調：你們不是讓我們提意見嗎，現在又反過來批評我們，這不是壓制批評嗎？你看，早已料到，先讓你放，現在要整了吧。有的認為大鳴大放就是為了找典型進行批判。

我認為有人只准一家鳴，不准他人鳴；只許我批評，不許你批評，否則就認為是阻礙運動（？）言論不自由（？）。記得在一次教授座談會上就有人声色俱厲地質問別人，你代表誰說話？現在我不免要問：這是幫助黨整風嗎？有的人在口頭上不是在說“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政策是十分英明的，表示極力擁護嗎？但為何不要人家鳴呢？當時我看有不少老教授對此甚抱不平。有人嘴里常常說黨委對整風決心不夠呀！我還有顧慮呀！其實天曉得，你還有什麼話不敢說呢？什麼“無恥”，“嘴臉”，“亂臣賊子”，“禍國殃民”等等已經在某些人的文章和發言中司空見慣。我真不知道怎樣才算毫無顧忌？鳴放的目的既然是為了弄清是非，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為什麼只能有批評就不能有反批評呢？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分開：我批評就是放，反批評就是整人呢？也有人說社會上只不過剛剛有人說了一些不好聽的話（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你們就來反駁，未免有欠雅量。我認為自從鳴放以來，大多數同志都是善意的向黨提出批評而且大多數的意見都是正確的，儘管有些意見與事實不符，有少數意見是錯誤的，儘管有些意見是十分尖銳，有些刺

人，即使有少數同志激於一時憤慨詞斥責破口大罵，只要是出於善意，這都是值得歡迎的，任何共產黨人都不應該對此有所介意。共產黨雅量是有的，不過共產黨人的階級愛憎是十分分明的，對於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是不能保持緘默的，因為人民不答應。對於全國範圍內的思想戰線上，向我們黨發動猖狂的進攻的右派分子，我們還能表示雅量嗎？一點也不能，必須堅決予以反擊，予以批駁。

以上說明為了把我們整風運動引向深入，就必須在思想上首先分清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善意的意見（儘管是十分尖銳的意見）必須同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劃清界限，這樣才不致被這些別有用心的人打亂了我們的整風運動。

另外在我院展開爭鳴還有另一重要的意義，就是對於我院的揭發出來的許多重大問題，只有通過各方的爭鳴各抒己見，才能分辨是非，才能澄清問題，才能根除「三害」，否則目前運動就無法深入。當然我在前面也已提到迅速處理目前所能處理的問題對於當前運動的開展也是很重要的，希望黨委迅速進行這一項工作。同樣我們在對錯誤言論進行反批評的同時，決不能放鬆對一切善意批評的支持和鼓勵。

爭鳴齊放，各抒己見，都應抱着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態度，採取說理論戰的方式，不應採取質問的態度，切忌亂扣帽子，如果有黨員想在反批評的借口下，對批評者施行打擊和報復，黨一定會給予嚴厲的處分。論戰的內容最好是一些重大問題，不要糾纏於一些小問題，開始最好不要急於解釋對黨員個人所提的一些意見。如果被批評者一定要進行反批評，當然也是允許的。由於思想水平所限，定有偏頗之處，歡迎批評，歡迎指教。

從全國人民利益出發

言午

通過目前的整風運動，使我們了解到老干班是存在一些問題的，如少數學員在實驗時，

要求教師讀數字，考試不考試，上課不上課，有不尊重學校制度的表現，還有人對工友同志們的勞動不夠尊重，這些問題是應該深入檢查，也必須加以改正，但是我們同樣亦要看到老干班的絕大多數的同志，是努力學習，刻苦鑽研，這種頑強的精神也是值得學習的。

在前一些日子裏，院刊、工會通訊，以及大學報上都提到要老干班滾出去，這個提法我是不能同意的，由於老干班存在的缺點較多，使群眾產生不滿情緒，這是很自然的，但是應該看到，這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要求和幫助他們改正缺點，是必要的，如果把他們簡單的趕出鋼院，對他們來說，沒有得到應有的教育，誰能保證他們在其他地方不再犯類似的缺點或錯誤呢？這難道不是對國家的損失嗎？我想更重要的，應該這樣來看，老干班的同志，他們經過艱苦革命鍛鍊，對革命的貢獻是很大的，而且他們具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和生產知識，今天在和平建設時期，需要他們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將來能很好的領導生產，對建設社會主義是會起到一定作用的。這是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要求他們學習，也是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那種叫他們滾出去的法子，是違背社會主義利益的，只片面的看到缺點，不從全面去分析問題，這顯然是不客觀的。至於在生活上，給他們的照顧，例如兩人住一間房子，在小灶食堂吃飯等。對這個問題我是這樣看的：老干班的同志，年歲較大，而且他們在這裡學習確實比他們在工作崗位上要緊張得多，何況他們在工作崗位上，也享有小灶住房的規定。我想這一點不能與青年同學來比，這種照顧並不是什麼特殊，我們應該知道，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國民收入，不可能也不應該有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

最後希望老干班的同志們，在整風中很好檢查自己，那些地方表現不好，應該糾正，要遵守學習紀律，對老師要尊重，要老老實實的學習，個別作風不好的同志，要向好的同志學習。

大家討論對肅反估價問題

談“肅反”中的群眾運動

姜中秋 張凱濤

在肅反問題的討論中，對肅反是必要的這一點，已為大家所公認。但對肅反是否要採取群眾運動，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我想就這個問題談幾點個人意見，和大家共同來討論。

解放以來我們有過幾次大的群眾運動，如：“土改”、“鎮反”、“三反”、“五反”等等，真是轟轟烈烈。通過這些運動，使農民徹底解放了；打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消滅了很大一批拿武器的反革命份子，另外群眾也受到了一系列的教育，這些成績是有目共睹，難以爭辯的事實。現在來看一看“肅反”是否要採取群眾運動的方式吧！

在我們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時候，國內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和外國派遣的間諜份子，打進我們的國家機關、工廠、學校、農村以至黨內，竊取我們的情報，進行各種破壞活動，並想從內部來瓦解我們。（當時破壞機器，殺害幹部、放火燒房等，報上經常看到。從羅瑞卿部長報告的材料也能清楚的看到這一點）要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很快的整頓我們的隊伍是刻不容緩的。在六億人的隊伍中，在這樣遼闊的國土上，要在較短的時期內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並非幾個公安人員力所能及的，只有發動全國人民才有可能。在數億雙雪亮的眼睛的監視和搜索下，在群眾自覺的檢舉下，我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在全國範圍內就出了八萬反革命份子（運動尚未結束），就鋼院這個小的範圍來看，就肅出了五個反革命份子，（按舊的法律界限是12個），檢舉坦白材料達4500多件，這些材料提供了我們更細致深入的追查反革命份子的線索，也是我們弄清楚問題真象的資料。很難設想光靠公安人員能得到這樣大的成績？我們能早一天肅清暗藏在我們內部的敵人，其價值是無法估計的。這些不正說明群眾運動的必要嗎？正是說明我們黨採取了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肅反的正確嗎？

有人說我們的群眾運動，不是群眾自覺的而是被迫的，我想這似乎太片面一點了吧！如果不是群眾自覺的來肅反，那請問鋼院當時參加運動的不到三千人，而檢舉、坦白的材料竟達4500多件，這又作何解釋呢？難道這也是被迫編出來的嗎？確實當時是有個別同學不積極的，領導上沒有耐心的去教育他們，而用簡單粗暴的方式要他們投入運動。（這就是當時有一種不正確的輿論壓力，也是某些人所說被迫的壓力所在），我們認為這是不對的。但這總究是少數。

還有人說採取群眾運動的方式容易出偏差，（指過激粗暴）是的，群眾有時是有些偏激的，但是不是一定要出偏差，這在於領導怎樣正確引導的問題，而不是群眾運動的必然產物。（我院所產生的一些偏差，我看是時間比較倉促，調查研究不夠，當時工作人員沒有給群眾交待清楚之故）我認為採取群眾運動只會使問題暴露得最全面，處理得最公正。並且我們的肅反還是群眾運動和公安機關相結合的，就是開始有些偏差，後經調查、研究是會糾正的（事實是如此）。

在談到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肅反的時候，有一個容易被大家所忽視的，也是群眾運動帶來的主要的成績，即提高了群眾的覺悟，摧毀了反革命份子得以生存的社會基礎。

通過肅反，群眾的眼睛擦亮了，敵我界限更清楚了，思想覺悟提高了，有很多人在肅反中因弄清了自己的歷史，包袱放了下來，更加靠攏組織了，許多人加入了黨團組織。（例如在機械系第一批畢業生的77位同學中，肅反前沒有一個黨員團員，也只佔總人數的40%，在肅反後短短的一年當中，10個同志加入了共產黨，團員也由40%發展到80%）。這不正是與肅反運動無關的。拿前面舉出的鋼院的檢舉、坦白材料有4500多件，這些也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由於群眾的覺悟的提高，眼睛擦亮了，使得反革命份子不能再在我們中間活動，謠言找不到市場了，那些以前思想模糊，立場不穩（即反革命份子利用的對象）的人，已成了反革命份子的掘墓人。所以很多反革命份子見勢不妙，只好投降自首，就連那些剛受過美國特務訓練的“堅決”份子，到大陸一看“朋友”都沒有了，也只好乖乖的向政府自首。這樣的實例在去年的報紙上不是常見到的嗎？這個

成績是無法衡量的。

上述成績的取得，除了群眾運動外，我還沒有想出更合適更好的方式（實際上是不會再有的）使它既能徹底肅清反革命，搗毀反革命份子的巢穴，又能教育廣大群眾，提高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所以我認為以群眾運動的方式肅反，失去的只是我們之中的渣滓、濃毒，而得到的則是一支更加純潔，更加團結一致的建設隊伍。

從社會主義立場看肅反付作用

張國華 唐孝緣

現在有一種人，這種人一方面在口頭上承認肅反成績是主要的，另一方面却強調肅反後的付作用，以種種事實來描述被鬥人心靈的創傷。認為這種“痛苦”領導者不能體會，言中之意，領導所談成績是“条条”。這些人實質上也否認鋼院的肅反成績也是主要的這一論點。

有人認為，兩種不同處境（即被鬥者與鬥爭者）對肅反就會有兩種結論，我們認為結論只有一個，問題在於立場是否一致。

從小資產階級側隱之心出發，那些被鬥同學的心靈創傷是不可彌補，錯誤是不可挽救的。的確，在肅反群眾運動中是錯鬥了一些沒歷史問題的人，使少部份人受到委屈，在過去，領導對這些同學被鬥後心情的體會與關懷很少。但是我們認為從社會主義立場出發，就不應該把個人自尊心放在黨的利益之上，我們會訪問一位老同志，他說在過去整風時絕大部分同志都被鬥過，他本人又被懷疑為特務，（最後是搞清了）但他們都把这鬥爭看成是對待自己嚴峻的考驗……這話給我們很大启发，無數同志在戰場上、刑場上犧牲了生命以換得今天的幸福生活，那麼為了徹底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在群眾運動中個人受到些委屈又有什麼呢。當然，這種主觀上的偏差是可以避免的，黨是要負責任的（事實上黨也正本着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精神向錯鬥的，或鬥爭過火的同志道歉賠禮，承認了錯誤）。

我們認為，只有站在共同的社會主義立場上，才能對肅反得到確切的估價和認識。這些意見願和同志們討論。

談知識界中的肅反問題

袁璋

人的道義感促使着這支忠實於我的筆，寫出久已存在的兩個疑問，這兩個疑問我曾經用過極大的努力，嘗試着去解釋它，我的心久久的沉墜在這兩個問題里。由於長時期的現實生活，使我初步得出了一些答案，也許這些答案會把我從疑問的約束下解放出來吧！

我知道我淺薄的知識和洞察力不可能使我的看法推廣到我們國家的每一個角落，所以，在這裡，我只就“肅反”在我們“大學生”里的情况，表述一下我自己的結論。

一、“肅反”的矛頭對的是誰？

同學們，你們完全可以這樣說，“肅反”是對“反革命”開火，是的，它是對“反革命”開火。“肅反”這名詞不也正是說明這一點嗎！——肅清一切公開的和暗藏的反革命份子。

可是，把問題局限到我們“大學生”里，如果客觀的回忆一下當時的情况，我覺得我們有必要重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當然，在這裡我不是說，“大學生”是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在它的組織成員里就沒有“反革命份子”存在，我只是說我們應該客觀的回忆一下當時的情况。

當時，絕大多數的“鬥爭會”不正是標榜着“批判×××的反動言論”嗎？看來只是一種反動的言論——與我們先進的社會主義社會所不相容的落後思想，而不是反革命行動——在我們健康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所絕對不能允許存在的東西，正因為“被鬥者”不是反革命份子，所以接待他的是一些激動的人群和對他的言論所不滿的斥責；如果我們有法律上所不能容忍的事實根據，足以斷言他是反革命份子的話，那麼我們就不會對他進行思想批判了，這位“被鬥者”早就會看到公安部門的逮捕証，誰見過人民面對着一個反革命份子對他進行思想批判呢？

當然，我們可以利用“鬥爭會”的形式來達到我們所期待的目的，比如在浩大的聲勢鼓勵的氣氛下對“被鬥者”施以精神壓力，迫使他“招”出他過去的重大歷史問題，並且“供”出他的組織關係，就在這個時候，我也不認為在我們面前的這個同學是反革命份子，因為我們終究還沒有他的“反革命材料”作為証實他的身分的依據，否則為何不將他送公安部門去施以肉刑，使他吐出真情呢？

這裡順便講一句，在我們公安部門里，基於人道和正義，對被逮捕的反革命份子，也沒有使用肉刑的辦法，以期達到迫使“供”出情報的目的，而在我們這裡却對一個我們所不能斷言他是否為反革命的同學，施以摧殘，以期達到獲得材料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我真不知道人身的權利和國家的法制都到那裡去了。

總結以上情况，我嘗試着得出第一個結論：在我們這裡，“肅反”的矛頭在很大程度上對准的是些典型的落後思想，言論反動的同學。

二、“鬥爭會”這種方式適合嗎？

是的，“肅反”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對待階級敵人我們應該毫不留情，我們採取任何的粗暴手段都不過火。

但是，如上面所說，我們是批判反動思想，“治病救人”的話，那麼，我覺得我們大有重新考慮適當的方式的必要。

當我一回顧起在“肅反”的那些日子裡，我就想到了一種奇形的壓力和怒吼的聲勢。是的，一些反動言行，必然會激起同學們的極大憤怒和斥責。當然，言之過激，情緒激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當時的聲勢還不止這種情况，把“被鬥者”擲在桌子上，大家圍着他振臂高呼，污蔑謾罵，強迫招認，哭喊御接……

為了說明問題方便，這裡舉一個例子吧！在馬林科夫同志辭職的時候有一個同學說：馬林科夫下台了！“在鬥爭會”上，這一句話就被提到日程上來了。一些同學群起，憤怒的高談：這是挑撥中蘇兄弟般的友誼，這是破壞蘇聯領導人之間的關係……歸根到底，這是反革命的動機和動機……這樣一句普通的話就引起了這樣一片激動的情緒，值得嗎？我覺得這句話倒不新鮮，而那種巧妙的推理邏輯倒是很可笑的！這裡我不願意羅列更多事實，一個就夠了。

首先，我們來看看，“鬥爭會”是不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肯定的講，誰也不能根據上面那一句話就說，“被鬥者”是反革命份子。我覺得要找根源的話，那只能說，這是先進與落後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說，他是人民內部的問題。既然這樣，那麼我們為什麼要把它提到這樣一種氣氛的“鬥爭會”上去呢？為什麼不可以和風細雨的批評批評呢？也許，當時沒有“和風細雨”這精神吧！但是，在那時候問題的解決，就只有佈置一個嚴厲的“鬥爭會”這種形式嗎？

其次，我們看看這種形式的效果。我們的黨中央經常這樣教導我們，對於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個極其細緻的複雜的艱巨的長期過程，過去，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黨作了不少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事實証明了黨的這個方針是正確的。

如果誰要想利用群眾的浩大聲勢，造成一種奇形壓力，根本上剷除落後思想和不滿言行，這是不可能的。雖然，“被鬥者”可以在這種情況下被壓倒，以後不敢說話，但是，在他的心靈深處，那種落後和不滿能根本剷除嗎？如果要是冷靜一點，那麼，我們就會發現這種“肅反”形式對於思想比較複雜而且具有一定的社會知識的大學生來說，似乎收到的效果不太理想吧！

最後，我們再來看：“鬥爭會”這種形式給人帶來了什麼？

同學們，我已經幾次的把你們引到了肅反的那些場面裡去了，恕我這裡不得不再說一遍，在那種陰森的气氛裡，“被鬥者”被吓倒了，他的筆聽從着別人的支配，写下了連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事；他的嘴不再受他的支配了，順着別人的意志說出了他以往沒有想過的事。他只是為了及早的結束對自己的精神摧殘，擺脫現實。“肅反”過去了，在一定的時期內，他也沉沒了，他失去了對人間溫暖、友誼和任何的嚮往，他不敢回忆起那些痛苦的往事，而只是隨着時間無聲無息的走着，因為，在他的內心深處打上了在一定時期內不可磨滅的烙印，啊！多么冷酷的效果，人的心和尊嚴被傷害了。

總結以上情况，我又嘗試着得出第二個結論：在知識界裡，以激烈的群眾“鬥爭會”來代替批判落後思想、反動言論，以期達到改造和教育的目的是不太適合的。

看！這是什麼話？

郭文田說：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工人說話了”一連串的社論是“不必和小題大作”。他說更不必以“工人說話了”而拋出王牌。他說：“如果發展嚴重下去，就會有殺共產黨人的事情出現。”

這又是為什麼？

郭文田

盧郁文在把他收到的匿名恐嚇信公開後，人民日報特為此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和一連串的社論“工人說話了”……我認為這是不必要和小題大作。就拿儲安平、葛佩琦等典型人物來說吧，這也不能給扣上個反革命的帽子，要知道這是一個最大的帽子，扣上這個帽子後就不能再講話了。

儲安平說的：過去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是黨外人士，而現在的副總理有十二個之多，但沒有一個非黨人士，莫非這不是事實嗎？莫非是讓各民主黨派也當家做主的表現嗎？真正是讓每個人量力而行嗎？我看：不少的黨員幹部不才而給職，而不少的非黨人士是有才而無職，有職而無權，當然也有少部分非黨人士受到重視，有職有權。但究竟還是少數，每個小部門也按上一個黨員做頭兒，這不是普遍的嗎？

再看葛佩琦說的最激烈的地方吧：至今群眾對鳴放還有顧慮，具體反映了群眾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述一遍，群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道路，总有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他並沒有說要發動人民去殺共產黨人，而是說你們再不改，那麼他的意思是要共產黨人改掉那些錯誤，不讓那些錯誤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發展下去是危險的，莫非不是這樣嗎？第一句話：至今群眾對鳴放還有顧慮，莫非這不是真的嗎？在過去說沒有讓鳴放，但很多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的政策是知道的，知道“知無不言，言而不盡，言則無罪，聞者足戒”，但事實呢？愛說話的人，愛提意見的人，有時發牢騷的人在肅反時有不少當了鬥爭的對象。例如：劉景芳教授在一次座談會上由於魏副院長向大家徵求意見，而劉先生把沒有準備的臨時想的都提了出來；劉淑儀教授由於在學術和其他某些問題上

和蘇聯專家的看法不同，而被認為反蘇、反共，後來成為肅反的鬥爭對象。假如二位劉教授是唯唯諾諾的人，對上不提意見，自己也不發表主見，恐怕也不會被鬥爭吧？他們對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算了解吧？但事實是後來被鬥了，他們去向誰說呢？誰來替他們申冤呢？他們把心裡所想的都說了，為何會有那種結果呢？現在也是一樣，雖說是讓大放大鳴，但鳴放後會否遭到報復，只是說：若有人報復，檢查出來會更加嚴厲處理，這樣的話過去也說過吧？今天也只是叫人民要消除顧慮大膽鳴放，但誰能保證他過後不受報復呢？用什麼來保證呢？這裏要提到的是羅隆基兩次發言的主題，要成立那麼一個非黨人士檢查組織為遭到報復的人來申冤，為鬥錯的人來申冤，來保證鳴放的人不受任何報復；這裏再說明一點：為什麼一定要非黨人士來組成呢？這是由於黨自己看自己不容觀，對給自己提意見的人要受到自己的保護而不受到自己的報復，這是很難保證的，所以用非黨組織來檢查和保證是必要的。這裏再舉個例子：我在鞍山大型廠聽說：大型廠出產的鋼軌檢驗，出廠時有鐵道部的人在檢驗，夠不夠成品他們決定，不讓生產鋼軌的部門再來檢驗鋼軌是否合格，如果是那樣，他會把廢品也當成成品而出廠。這就說明了這一點，必須有保證才行，不然，顧慮永遠是消除不了的，莫非葛佩琦說的這句話不對嗎？至於說殺共產黨人，推翻共產黨，並不是現在要推翻，而是說再這樣或更嚴重的錯下去才会有那樣的事情和那樣的後果。這裏我再舉個例子：在余糧收購時，有些農民已經沒有余糧了，但是幹部（或是說共產黨）還迫使他交余糧。結果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他忍心把留的僅夠自家吃的糧食交了去，他回家就上吊自殺了。（北京日報登過）假如他不這樣做，逼他怒髮沖冠的時候，他不自殺而去殺那些逼他交余糧的幹部，共產黨人，這不就和這裏所說的相符合了嗎？如果發展嚴重下去，那就会有殺共產黨人的事情出現。再比如在西北某地合作社里把比價定得極不合理，用三只羊賣給合作社而只能從合作社里買回一只羊皮來。這樣的事情也逼使人民去做，如果不檢查，不改進，嚴重地發

展下去，它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問題是說不改正和更嚴重地發展下去，會有那樣的結果，我對葛佩琦的話就是這樣理解的，我看他也是指這個意思。現在整風，讓大放大鳴，向黨提意見，不是正在改正這些錯誤不讓這些錯誤更嚴重地發展下去，這不是正在挽救嗎？

有杜黎均作“人民在此不許動手”中舉了這麼一個例子：一個陰惡的“醫生”，聲色俱厲地對病人說：你的病既不是感冒也不是頭痛，你的病就是該死，應該一刀把你的頭砍下來。請問這例子恰當嗎？醫生真的要砍病人的頭嗎？我看醫生並沒有這樣，他只是說：病要趕快治，不然很危險。同是這樣事情，我再換個方向來舉例你就会有另一種感覺了。有一個很嚴厲的醫生，他向來為了給別人看病不惜一切代價，但是在給病人治病的時候，有一個人喊叫：“危險！危險！”這樣對病人有什麼好處？只會使病人精神緊張，甚至病人一怒說：“我的病不治了”。試問不治什麼時候會好？我說：醫生並沒有要砍你的頭，你還是要治病的。

盧郁文收到匿名恐嚇信也不必大驚小怪，人民日報還特為此發表社論，我認為是小題大作，試問現在誰還能嚇住誰呢？不會的，你收到那麼一封匿名信也不要那麼害怕，你還可以照常鳴自己的。你認為你是非黨人士而受到重用，你可以說和共產黨相處得很融洽，可以說自己和黨之間沒有溝和牆。這實際也是有的，但是有溝和牆的人還是有很多的，他們還是要拆牆填溝的。人民日報在六月八日到十二號連續發表幾篇社論是不必要的，只有那些已經證明是反革命分子才能加上這個帽子，加上按語號召人民向他們開槍，這樣過早的下結論恐怕過後要翻案，更不必以“工人說話了”而拋出王牌，這樣恐怕那些人今後就難鳴了。

以上是我對這些事情和話語與他人體味不同，是要看說話人真的是什麼意思？什麼目的？不要誤解別人的意思，假如真的是反革命分子當然要鎮壓，真的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我們不應該允許。再看九三學社的領導人之一，光明日報的總編輯儲安平及人民大學的講師葛佩琦是不是反革命，可以查查他們的历史和其他情況，如若不然，就是不能給他們扣上這個帽子，不能一棒打死，只能更客觀的來看他們所說的話，即使是有不妥之處，應該用反批評、指正的態度來解決，當成提意見過火來認為，而不能把反革命的帽子扣上去。

北大的“黑格爾”派在幹些什麼？

軋61.2 劉復麟

六月十四日，我和另一位同學訪問了北大，對他們學校的情況了解了一些。現想據我所了解到的，就“黑格爾”派的言行發表一些意見，供大家參考。

萌芽

在五月十九日，北大出現了譚天榮寫的“一株毒草”的大字報，他狂妄的說：馬克思主義在1895年以後“按着鐵的必然性轉向自身的反面”，說“再論”是什麼“唯心主義”的產物，在他看來，好幾世界上只有他一個人是“天才”，是懂得“真理”的人，所以他譏罵幾乎全體的物理學家；說“三好”學生是“白痴”（註）；他並獨創了一套“真正的”物理學，企圖否定現代物理學的一切。據他的“發現”，“力”是什麼“效率的表現”，由於從“力”的概念上的不同，當然，一切物理學的解釋都變了。假如他真正發現了什麼，那倒是挺好的，但事實並非如此，他的“證明”只是一些牛頭不對馬嘴的胡說。

譚的“一株毒草”使全校馬上沸騰起來，反對他的，支持他的連續出現，這兩種勢力的鬥爭是相當尖銳的。但情況並不象于生所“忧虑”的那樣。北大不是處於“無政府狀態”。清華同學給于之回答很好，他們說：“我們並不感到忧虑，因為北大有六千多共青團員，並非六千多三青團員；北大是共產黨領導，而非國民黨領導。”

很多人稱五月十九日為“五一九”運動或“五一九”，有些人對“五一九”運動“評價”很高。他們說“五一九”是與“五四”具有同樣偉大意義的思想運動，而北大是“启蒙者”，他們要將它的“影響”擴大至全國，好幾除他們這幫狂妄者以外，其他人都上了麻藥似的。怪哉！

“五一九”發生以後，馬上以譚天榮為首組織了“黑格爾”派並與林希翎取得聯繫，請林到北大發表了兩次演說。後來他們印發了刊物“百花社”。最近又重新要辦規模更大的“廣場”。未成功。

他們的言論

正象大家所知的那樣，“聰明”些的人干事是“聰明”的。他們正是如此，他們也喊是“為了幫助黨整風”，也喊“毛主席萬歲！”但實際內容却完全不是這樣，他們的言論是反社會主義的。從上面譚的一些言論中可看出來，但還是多看些例証吧：

在譚天榮的“幾句人情話”中這樣寫道：“……現在有三種力量已經形成了一支可怕的百萬大軍：①認識了歷史必然性的戰士們。②那些樹葉一樣被蹂躪的人們。③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反人民的魔鬼們。這支大軍為自己开辟道路，誰要阻撓，就是毀滅，一絲一毫不差的毀滅，我們青年學生應該是第一種人……。”很明顯，這不是什麼“幫助黨整風”，而是在進行別有用心的勾當，我相信，我們（至少也是我們的絕大部分）是決不會參加他所指的那支“百萬大軍”，我們要參加幫助黨整風的百萬大軍。

在一篇只述學號的“瘋子”的話的文章中，說現在的學校只是“民主”、“自由”等口號的積累，而“實際上是不民主，不自由。”難道我們作為一個生活在學校里的學生，能同意他這樣的胡說嗎？不能，那是完全不符合實際的。

他們還把馬列主義比作聖經，馬克思比作耶穌，各地區委書記比作教主，而教王則不敢比下去了，因為他們還要喊“毛主席萬歲！”足夠了吧！這難道不可以清楚看出他們實質上在干什么別有用心的勾當嗎？能夠看出的。

他們的行動

據了解，他們之中有“傑出的詩人”、“傑出的女學家”、“傑出的煽動家”、“傑出的……”，他們很善于罵街。

為了“擴大影響”，他們曾到清華演講，把被子、行李賣掉到天津去活動了兩天，聽說他們在暑假還要南下咧！“幫助黨整風”難道要這樣作嗎？

儘管他們到處碰釘子，但他們毫不氣餒，說：“沒什麼，達維道夫（註：“被開垦的處

女地”一書中之主角）還要挨婦女們的打呢。”

在六月十三日晚上，他們要借廣播器，工人因他們沒有學生會借條而拒絕，譚天榮、劉奇弟便毆打工人。這一無恥行為，已激起全校同學的憤慨。

他們內部象什麼樣子，我不會形容，但情況是這樣，他們的“社”是“社可以不對個人負責，個人可以不對社負責。”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這種“絕對自由”的濫調。難怪譚天榮現在也退出了這樣的“社”了。

工人們的話！

前面已說到，最近他們要辦“廣場”，但破產了，事情經過是這樣：

他們把稿子交給北京第一印刷廠，說很緊急要趕快印出。任務交給了當夜夜班工人，工人們排了一點以後發現里面的東西很不對頭，於是拒絕排下去。廠長等考慮到現在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期，故又交給白班工人，工人排了一段以後，同樣，又停止工作了。恰巧下午“廣場”的兩位“編委”去“檢查工作”，工人們知道是他們來了，便都來了，質問他們為什麼要反對社會主義？為什麼要寫這些反動東西？平常口舌流利的“傑出的詩人”、“傑出的……”反常了，他們變得口吃了，說話含糊了，幸亏廠長等幫他們解圍，他們才灰溜溜的逃了。

工人們十分憤慨，他們先還不相信這些稿子是來自北大的學生中。當廠長向工人們解釋，要大家繼續排字時，工人們說：“不行，我們不能用我們自己的手來打自己的嘴”，“我們不能用我們的双手來散發反社會主義的傳單！”……

工人們還決定扣留他們的稿子向檢察院提出控告，並要求賠償損失！

當我听了、看了這些情況的材料後，使我有充分的理由說：“黑格爾”派是在“幫助黨整風”的幌子下，干着別有用心的勾當，他們的言論是反社會主義的。

我也深深的被工人們的言行所感動。同學們，讓我們起來共同反對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吧！註：這些材料，見東西飯館之間“北大情況”的黑板報。

評周大覺所作“我對目前局勢的看法”

及“管見補遺數則”

机61.9班 王幼孝

前言

看了北京航空學院周大覺先生以反對“主觀主義色彩，教條主義味道”立言的大作“我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和“管見補遺數則”以後，本人不揣冒昧，對周先生費了半年多時間研究出來用以指導國家發展方向的高論，頗有疑問，特提出來與周先生共同研討。由於時間倉促，周先生文中所列列寧、斯大林、鐵托等同志的著作原文出處，均未註明篇名頁次，未能詳細查考，以下討論中論據有不够“經典”之處，尚祈周先生雅諒。

一、所謂“領導者階級”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周文一開始就“斷章取義”地摘引了列寧關於階級的定義的前一部分：“……階級是在歷史上一種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係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及多寡各不相同的幾個巨大的集團”。而將後一部分“所謂各階級，就是由於彼此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地位不同，而有某一集團能佔得另一集團勞動的各個集團”。（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592頁）故意略去，從而根據他的四個論點，論證了“領導者具有以上形成一階級的必要條件”。

從列寧這個定義，對階級的實質和階級劃分的方法，是非常明顯的，那就是“階級是因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而形成的不同集團”（學習雜誌社“哲學常識”101頁）。劃分階級的方法應該是主要根據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歷史上的所有剝削階級，無論是奴隸主、地主或資本家，他們之所以能夠佔有奴隸、農民和工人的勞動成果，先決條件便是剝削者掌握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條普遍存在於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的真理，似乎不是周先生所喜歡的。因為如果把剝削和被剝削的對立關係一說破，周先生那些似是而非的論據顯然就會落空。於是周先生拾出了斯大林來“壓陣”，說是：“生產關係包括所有權及支配權兩個平行的內容，詳見聯共黨史中斯大林所下的經典定義；只強調所有權是顯然是不對的”（引號內字句均系周文——王註）。但是周先生卻並不把所有權和支配權當作“平行的”內容，而只“強調”支配權。因為周先生未說明這個經典定義寫在那篇那頁，本人也未去遍翻“聯共黨史”。

然而，這也沒有給周先生創造什麼有利條件，因為事實是不容任意歪曲的，我們的領導者對生產資料的支配，只不過是群眾的委託，執行其在“生產活動中”的社會分工，他們誰也不能“支配”生產資料為自己所有。關於這個問題，6月18日“北京鋼院”刊載的李慰館同學的文章已經談得很透徹，本人不再重復。周先生說：“‘毛選’第一篇文章就提出買辦階級這一概念，買辦沒有生產資料僅僅具有國家財富的支配權”幸好這回我找到了出處，在毛澤東選集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寫道：“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屬……”這里找不到足以論證周先生的論點的內容。試讀一下中國近百年史，買辦階級即後來的官僚資產階級的形成過程，似乎是這樣：最初的買辦，只不過是國際資產階級推銷商品的經紀人，要把它從國際資產階級那里分出來，獨立成為一個階級，是否說得過去？而那时的買辦，似乎也並未“具有國家財富的支配權”。到了由買辦發展成為“具有國家財富的支配權”的官僚資產階級時，似乎也就有了生產資料。只有“光輝的馬克思主義”者才會說：四大家族是沒有生產資料的。

周先生的四個論點，實際上前三點都是所謂支配地位的問題，管見已如上述。還有一點需要商榷的，是所謂領導者“在生產體系中處在領導地位，不進行生產活動，而靠進行管理活動獲得經濟上的優勢”不知應作何種理解。如果這個“生產活動”是“政治經濟學名詞”的話，它應該包含了“在生產體系”進行的“管理活動”。如果故意不看這些進行管理活動的人是代表那個階級，而把管理者和未參加管理者分為兩個對立的階級，按照“光輝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種邏輯，當然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代表工人階級進行管理活動的人們是“領導者階級”，而未直接參加管理的工人和其他階級則是“群眾階級”。同理可證：（1）資本主義國家的當政者和直接管理企業的資本

家代理人是統治者“階級”，坐食紅利的資本家和工人、農民們是被統治“階級”。（2）封建社會的帝王官吏和地主的管家們是統治者“階級”，而坐食現成的地主和農民、手工業者是被統治“階級”。……不知周先生以為然否？

周先生所舉領導者“形成一階級必要條件”的第4點是“領導者不是一盤散沙，而是一個具有組織的集團”。這里沒有明白指出這個“集團”指的什麼，但從後面提出“黨的領導應逐漸退出生產體系”（領導二字原來是加了括號的——王註）來看，不外是黨的領導吧！如果這個集團就指共產黨，我想請周先生睜開眼睛看一看，我國上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付委員長、各部長，下至科長、股長、企業廠長，其中非共產黨員甚至非民主黨派成員的都大有人在，而在這些非共產黨員領導下工作的共產黨員又何止千百！如果說所有領導者是一個階級，那就不是“一個具有組織的集團”了。只要正視一下現實，當會看見我們國家所有管理政治、經濟活動的領導人員，都是通過一定的選舉和選舉出來的上級任命的。他們分別受一定組織和群眾的有效監督，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為人民服務。並且許多擔任領導工作的人，過去都是工人出身，有好些是不久前才從機器和農具旁選拔出來，而有些人現在仍直接從事工農業勞動。由此可見，領導者不是一個“階級”，而且共產黨也不是一個“領導者階級”，正如南共不是一個領導者階級一樣。

周先生還提出“分析階級的幾個應注意的問題”，以免“引起人們思想混亂”。很顯然，周先生信心不足，已經承認了自己的論據沒有現實意義，只好說“階級是否正在形成並不取決於它怎樣形成”。這句話是有些道理的，但想要用“奴隸主是人民公仆被人民選出來後逐漸形成的”這一公式來說明領導者就會形成一個“階級”的話。那麼，被周先生選作標本的南斯拉夫，自從解放以來，十多年中主要的領導人如鐵托同志們仍在領導着國家，是否也正在日趨形成一個領導者階級呢？或者，實行委員制的瑞士聯邦，其最高領導的九個委員連選不得任，是否就不存在階級了呢？不知周先生何以見教？

二、也談幾點管見

（一）南斯拉夫的經濟發展情況 我完全同意對南斯拉夫、波蘭制度應多加研究。但對周先生指為學習榜樣的南國制度，頗有疑問。周先生承認南國比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生產數字稍低”，說是“原為沒有蘇聯幫助”之故。這樣說恐怕也有點“主觀主義色彩”吧！如果周先生不那麼健忘，應該記得以下事實：（1）蘇南關係破裂是1948年的事，在此以前，蘇聯同樣給了南斯拉夫各方面的援助。（2）蘇南關係破裂後，美國即以援助為名，給南斯拉夫大量貸款和物資。（3）在簽訂對德和約時，南斯拉夫得到了德國賠款的幾乎一半（是蘇聯為之力爭得到的）。雖然如此，南斯拉夫仍然負了巨額的外債。何以優越的制度，竟這樣不起主觀能動作用呢？只好請教周先生。若從人民生活來比較，南國的農業至今未超過戰前水平（也請注意，南國是个体農戶佔優勢）。由於自由競爭的結果，物價不穩定。這些是否足以說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多呢？

（二）中國、蘇聯和南斯拉夫分配情況的比較

周先生比較了中國分配情況，認為中蘇是“上級規定”，相差懸殊，因而是“不合理”和“差勁”。而南國是“社會公認”，相差很少，所以是“真正的”按勞取酬。依我看，周先生未免又有点“主觀主義色彩”。本人不知南國最大鋼鐵廠到底多大，但“主觀”以為不比鞍鋼大。鞍鋼經理的工資，不過三百多元，而一般技工，也在六、七十元左右，高者達百餘元，何至相差“二、三十倍”。而在蘇聯，服務員工資最低為三百盧布。高工資則包括三類人：第一類是先進生產工人工資高達三千盧布，連同合理化建議和超計劃所得獎金，有時還要超過此數；第二類是將軍們，除按職領薪外，還按勳章愈多，收入當然更多；第三類是科學家。這三種人不知可否列入“對社會

有特殊貢獻”者之列，抑為“領導者階級”。此外，蘇聯還從物價方面調節生活水平，一般生活用品價格極低，每高一級，則加價許多。這樣就使低工資和高工資收入的人，生活水平相差不會太遠。這種措施，是自由競爭制度所不能作到的。何以就是“不合理”？又周先生認為“錢學森、馬連良等收入很大，仍然合理（問題是被社會所公認）。”看來我們毛主席月薪約六百元，是不被“社會所公認”的了，但可惜周先生並未經過“群眾階級”“公認”為“社會”的代表者，所以還只能算作“個人評價”。

（三）關於舊思想殘余問題

周先生分析了各種舊思想意識，總結出“等級觀念、個人崇拜、官僚主義……等等”都是“反映着濃厚的封建色彩”，如果說不是目前生產關係的產物，就是“要推翻思想意識決定於生產關係這一唯物公式”。為了“集思廣益”，我想提醒周先生一下，割斷歷史、孤立事物的“辯証法”是不能得到正確結論的。從舊社會到新社會的改變，不是在一夜之間就能從政治、經濟制度到思想意識都一下就截然兩樣的，這不象演劇換佈景那樣簡單。儘管經濟生活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而舊的思想意識並不會自動消亡。何況我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轉變過來還不到十年，目前階級殘余也還存在。正因為“三害”是舊社會思想意識的殘余，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才能用進行思想鬥爭即整風的方法消除三害。如果周先生還要肯定“三害”只能是今天的社會制度的產物，本人再拿“南斯拉夫的內部情況”來對比一下。在南國會談後不久（具體時日記不清，查人民日報索引，當能找到），鐵托同志的一次演說中曾經提到，南共的成員變動很大，其原因當不是思想意識完全無產階級化之故。又南國領導者中，也出過熱德拉斯之流。南國也有監獄和法院，似乎也還有人犯罪。不知周先生能否從南國現有的生產關係中找出答案來？

（四）關於學習南斯拉夫的“優點”問題

周先生說南斯拉夫的“自由競爭”不是資本主義式的。特點為：“生產由社會自然需求來調整，客觀地反映人民要求……”。優點很多，包括年終分紅制，而無“大魚吃小魚”、“破產倒閉”之弊。我不明白，周先生所舉的那些優點是否只有“自由競爭”才能具備？而能夠明白的，則是生產經營不善的企業，確要倒閉；市場的物價，確要波動。雖然決定南斯拉夫的經濟組織形式，該國人民內部事務，不勞我們操心。但我們自己的家，還要仔細核計一下，却也不能“教條主義”式地硬去學別人尚未見效的“優越”制度。附帶說一點，我國和南斯拉夫是兄弟之邦，政府並沒有把“異己”視若仇敵。我個人也深以不能詳細了解南國情況為憾。但去年我國代表團去南國回來後，也並沒有能毫無拘束地了解到許多南國的內部情況，這也該使周先生“有所不滿”吧！

結 束 語

周先生的大作，牽涉問題很多，本人才疏學淺，不能一一論及。並且許多一般性大問題，如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等，人民日報近來的文章和“航院生活”6月4日所載秦小悟的文章，都已談得很多。對周文的中心思想，本人沒有聯繫立場來分析，以免會有“一棍子打死”之嫌。但有一句忠言要向周先生提出：要作一個“光輝的馬克思主義”者，還得從馬列主義基礎知識學起。要想使“黨的領導逐漸退出生產體系”，這只不過是“高明人士”的白日夢。最後表明一下我的身份，本人既非共產黨員，亦非共青團員，乃屬於“群眾階級”之一員。對周先生本着請求“持教”精神，並無“鄙夷恫吓的態度”。以上管見，敬請周先生和周文的支持者指正。

來 函 照 登

院刊編輯同志：

六月十八日81期第五版刊登的堅決回擊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文章中，請作如下更正：

治602 劉海青系劉漢卿，是從農村工作崗位來的，知道和看到過這些事實，並非本人經歷；

文中所提50年水災時老百姓吃的是小米和黍糧，系平常人們所不用作充飢的河蚌和湖草（只當作肥料和飼料），政府也沒有糧食全部救濟，只能以工代賑，而54年的空前大水災，正是因為實行了統購統銷，老百姓吃的是政府的救濟糧食……。

另第九行陳長佳同志所述長江下游一帶系韓江下游一帶。

治601張之璞系治602張志璞。

治602 劉漢卿